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叙述与认识

NARRATION AND KNOWLEDGE



[美] 阿瑟·丹图 著

周建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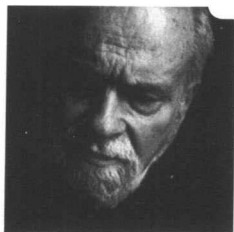
叙述与认识

NARRATION AND KNOWLEDGE



[美] 阿瑟·丹图 著

周建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述与认识/(美)丹图(Danto, A. C.)著;周建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8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书名原文: Narration and Knowledge

ISBN 978-7-5327-4324-7

I. 叙… II. ① 丹… ② 周… III. 历史哲学-研究 IV.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8766 号

Arthur C. Danto

Narration and Knowledge

©198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图字: 09-2005-552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叙述与认识

[美] 阿瑟·丹图 著

周建漳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25 插页 4 字数 336,000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978-7-5327-4324-7/B·268

定价: 33.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21-56135113

译者序

历史的哲学理解与逻辑分析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翰生(Johnsonian)哲学荣休教授阿瑟·丹图(Arthur C. Danto, 1924—)在历史哲学行内及美国哲学界是个颇为响亮的名字,曾担任过美国哲学学会主席和美学学会主席。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密歇根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复员军人进入位于底特律的维尼州立大学学习艺术。值得一提的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另一大家海登·怀特当时亦为此校学生,更有意思的是,激发了丹图对历史的兴趣的博森布鲁克教授(Bossenbrook)也是怀特的老师。本科毕业后丹图本想到纽约大学师从悉尼·胡克(Sidney Hook),却因不具备哲学专业背景被拒绝,哥伦比亚大学欢迎本科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他于是进入哥大,并最终成为哲学系的一员,在那里他与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同事。

丹图在学术上涉猎广泛,取精用宏,研究领域涉及哲学多个门类乃至文艺批评,其中尤以在艺术哲学方面的造诣享誉学界。在其漫长学术生涯中所发表的至少 50 种学术著作中,他 41 岁那年由哥大出版社发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1965)^①是他的处女作。41 年过去了,这本书今天读来在总体上仍不失其学术分量。依照当代西方另一位历史哲学名家安柯斯密特教授的评价,丹著(丹图所著《叙述与认识》的简称,下同)是“自柯林伍德

以来以英文写就的历史哲学论著中屈指可数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②众所周知,分析哲学是支配西方尤其是英美哲学界的显学,就其对历史哲学的影响而论,亨普尔那篇题为《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是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文献,此外,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中亦包含与历史哲学有关的部分内容,但丹著是关于分析历史哲学的专门著作,在篇幅及系统性方面非前者可比,在理论的深度方面亦不逊于前者。顺便指出,国内历年来对西方历史哲学论著的翻译引进大致集中在19世纪批判历史哲学和晚近叙述的历史哲学方面,对于分析历史哲学论著的介绍相对滞后,这与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实况不甚相符,丹著的翻译出版由此有了另一层意义。

历史哲学是译者近年来用力相对集中的领域,翻译本书为我提供了一个对原著做进一步探讨的机会,在此将自己的一些认识与理解写在下面,与中译本的读者共同切磋。

一、以时间为基点的 通盘哲学思考

任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考最终都不能绕开时间,因为,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历史性植根于时间性中”。^③虽然丹

① 该书在出版20年后于1985年又出了修订版,丹图在原书基础上增补了最后三章,并将书名改为《叙述与认识》。不过,从他自己在再版序言中所提供的情况,后三章中至少有两章是发表在本书初版时间1965年前后,因此,这本书可以说反映的是他近40年前的思想观点。

② 参见 F.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41.

③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三联书店,1987,第442页。

著并未专门就时间范畴本身展开类似海德格尔那样的哲学思辨,但在他关于史学与实质的历史哲学(通常称作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分野、历史句子的意义、历史与编年的区别、叙述问题以及其他时代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中在可以体察到时间性的踪影,因而,时间性对于我们理解丹图的整个历史哲学观点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历史即过去(the past)乃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是,历史之为过去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进而,历史仅仅是过去吗?在哲学的意义上,过去与现在乃至将来这另外两个时间维度是什么样的关系,从而时间还有历史的特质何在?这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哲学分析。

我们知道,一切的过去从时间上说都曾经是现在,所谓“历史的现在”(historical present),而现在之成为过去是在将来之“到时”(海德格尔语)中发生的,从而历史乃是“现在的过去”(past of present)。^①由此可见,时间上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是相互依存且并无确定界限的不同维度,而历史之为过去也就不好被看做是某一由例如年号固定下来了点,在形而上层面上,历史之为存在恰恰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这由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时间即历史的“河流”隐喻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这表明,时间或历史具有像因果一样的关系性品格,属于关系性的存在而非实体性的实在。我把历史存在的这一关系性特征称之为它的“两间性”。

历史存在的两间性在语言中的表现就是丹图所称的叙述句(Narrative sentences)。叙述句“是历史著述中出现的最典型句

① 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Hist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2, Ch II.

子”，“它们最一般的特征是，虽然它们只描述（只关于）所涉及的最前面的事件，它们涉及至少两个在时间上分开的事件”。（丹著英文本第143页，以下凡丹著引文只注页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莱克辛屯事件开启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进程”，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句子逻辑上要求日后反英战争的发生甚至成功，换言之，历史事件在历史坐标系中的客观定位通常要参照日后的事态发展获得确定，因此，历史出场每当历史不再。在认知的层面上，各种事件如“五四运动”、“三十年战争”等往往都是由后来者命名即赋义的，当事人“除非按预言的方式说话，我们不能对该事件做出这样的陈述”。（第18页）

关于历史的上述哲学理解中包含着一些值得重视的理论后果，首先，丹图关于编年、历史及实质的历史哲学的观点可以由此获得统一的说明与论证。

说起编年与历史的区别，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著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他在这本书中开宗明义就直接提出了“历史与编年史”的问题。克罗齐提出这一问题的主旨是要强调历史应该与人类现实生活建立联系，只有与现实兴趣挂钩的历史著述才是有生命力的，而单纯履行记忆职能的历史记述是空洞的，历史在其中成了无可挽回的过去。因此，历史与编年的根本区别在他看来乃是“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①丹图认为，克罗齐由人类旨趣的角度切入两者区分不得要领，他嘲笑克罗齐关于两者的“死”“活”之说“有点像是说人是活的尸首而尸首是死的人”。（第116页）丹图更重视的是英国历史哲学名家沃尔什由单纯记载发生了什么的“朴直叙述”与包含对所发生事情的解释的“有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8页。

意义的叙述”为编年与历史的分界线的观点。丹图的分析涉及复杂的细节,例如,他批评了沃尔什以希腊艺术与 19 世纪政治史作为两种叙述的例子是不恰当的,只有艺术家名字和作品标题的一份清单本身不是叙述。但归根结底要害在于,尽管在认知上说,仅仅感知并说出比如“一道闪光”和解释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爆炸”是存在着明显差别的,但是,这一差别与“仅仅说拿破仑败于滑铁卢和接着解释他为什么败了是不一样的”,“‘拿破仑败了’不是一个叙述”。总之,根据丹图的看法,世界上并不存在不包含解释的什么叙述,反过来说,一个的确解释了什么的叙述不过就是说出实际发生了什么,“因而按沃尔什的标准算是一个朴直叙述”。(第 130 页)因此,沃尔什的想法最终因为对叙述的误解也是不成立的。

在丹图看来,编年与历史的真正区别全在其与将来的时间关系上,前者属于当事人视野下的当下描述,而后者则是将当下事件的未来后果包括在自己视野中的叙述。在当下视野中,即便我们有一个事无巨细尽收眼底的“理想的编年者”,他也仍然没法知道他想知道的历史事件的真貌:如果不是参照后来事件的发展,没有人能在 1618 年的时候说出“三十年战争现在开始了”这样的话,这里甚至没有什么三十年战争,因为,谁在那时能有根据地说这场战事将不多不少正好延续 30 年?相反,“叙述句子给出关于事件的描述……很重要是这些描述参照了在时间上晚于其所描述的事件的后来事件,从而在认知上对于现场观察者来说是不可及的”。(第 xii 页)通过编年与历史的这一区别,丹图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仅仅是对事件的当下完全记述并不能满足历史研究的要求,其道理类似于空间上只在此山中恰恰无以言此山。还有,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如果我们的兴趣是历史的而不是编年的,“不能目击事件并不那么糟”,(第 152 页)而

“事后诸葛亮”的地位未尝不是一件好事。^①

如果说编年的缺陷是株守当下不及后来,那么,实质的历史哲学则属于另一个极端,它试图讲述关于整个历史(注意,这超出全部过去的范围)的故事,而历史哲学在这样做时“运用了历史学家用于组织过去事件的同样的结构”(第17页),也就是说,参照所描述对象的未来对其对象进行描述。但是,与历史哲学截然不同的是,历史学家所参照的未来终究属于对他而言的过去,因此原则上是可以被把握从而合法的,而思辨历史哲学家所试图的则是从相对于过去的将来向绝对的将来的神圣一跃,这实际上是预设了在整个历史之外的时间支点或认识支点。按照丹图所同意的洛维特(Löwith)的观点,“看待历史整体的这一方式在本质上是神学式的”,(第9页)它总是涉及某种目的论的视角,以此整合和处理任一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历史人物的历史定位:在奥古斯丁那里,历史的终点是《上帝之城》的实现;对于黑格尔而言,整个历史是以朝向理性“世界精神”实现为哲学隐喻的关于自由的实现的故事;而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以原始共产主义始真正共产主义终的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的辩证进程,等等。

丹图对实质的历史哲学在认识上的合法性持明确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被错误地构想的活动……哲学家试图对事件给出从时间上说是不恰当的描述”。(第14页)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的上述关系使我们想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于理念是将知性范畴作超出经验范围的运用的结果的分析,这与历史哲学将

① “事后诸葛亮”本身就带有贬义,事实上,它也可能陷人于以历史中的实然发展为必然逻辑的思想陷阱,对此感兴趣者可参阅拙作“‘历史’思辨”(《新华文摘》1999年第5期)。

历史学所使用的叙述模式作超出合法时间范围的运用在思想方法上是平行的。然而,根据康德,理念诚然因超出人类认识能力的界限陷入不可知的境地,但这并不等于理念是不可思的,它在我们的认识中仍然可以推演规范性的角色。^① 对于实质的历史哲学,我们也许亦应作如是观?

作为一本以语言的逻辑分析为主要风格的哲学论著,将对于思想与语言内蕴的时间维度运用于对经验主义意义证实原则的分析恐怕是最为切题的工作了,于此也显示出部门哲学的一般哲学意义。

语言的意义问题是分析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关于意义的经验证实标准主张,非分析性句子的意义最终由可以观察得到的经验事实获得证实,据此,对“上帝在天堂里”和“那只鸽子在笼子里”两个句子的意义判定一清二楚。这样一个看起来十分符合人们关于科学的直觉的简单明晰的划界标准仔细分析起来却有将自然科学中的普遍规律命题当成意义可疑的话语排除在外之嫌,此外,奎因在他的名作《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的分析中也论证了科学命题的意义是由科学命题体系整体确定的,不能被还原为记录直接经验的单一语句。通常关于意义证实论的原则批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它与历史学中关于过去事件的句子的不相容性,在本书第四章中,丹图专门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详细的讨论和分析。和一切学术论述尤其是分析哲学风格的论著一样,丹图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涉及论题的先行廓清及各种细节的讨论,但基本的理论线索仍然是基于句子的时间维度与经验验证的关系展开。

① “‘自悟性概念所成而超越经验可能性’之概念,为理念。”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兰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257页。

关于经验一个必须明确的特性,就是它总是于当下现在或未来某一时刻在场的,我们的经验没法在时间之流中做逆向运动,回转过去。因此,从经验出发谈论语句的意义,逻辑上只能是像刘易斯(Lewis)及艾耶尔一样将有意义的句子视为隐含地具有“如果——则”结构的关于未来经验的预说:如果我以特定的方式行动,就会获得特定的经验,例如,假如我咬一口尝到甜味,摸一摸是光滑的圆形物……这就是关于“这是只苹果”这个句子可以被经验证实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所能设想的关于过去的具有经验意义的陈述只能寄托在当下所有的证据之上。丹图认为,关于我们只能在证据的基础上了解无法观察的过去的老生常谈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关于过去的陈述隐含地是关于未来经验的言说”(第43页)这样的观点。“如果每当我想指涉过去事件,我发现自己所做的却是关于我的未来经验的预说,我怎么能把这些经验说成处于与过去事件有证据的关联中?”(第37页)

艾耶尔在经历了坚持与放弃关于过去的陈述可以被翻译成关于现在和未来经验命题的观点的立场动摇后最后主张:“不存在关于过去的陈述。”(转引自第53页)他认为,像“恺撒死于公元前44年”这样的历史句子是在指陈一个事件,但不是一过去事件。这就好比在空间关系上一个杯子事实上可以挨着一个盒子,但这种关系并不像杯子的颜色(绿)或质料(玻璃)那样构成杯子本身的规定性,因此,说这是个“挨着……的杯子”是没有意义的。熟悉休谟关于因果不属于事物本身的客观属性的分析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一思路与之如出一辙,同时感觉到康德关于时间不属于经验材料的立场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研究》中探讨过的如何将语言与其所谈论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放进语言中去的著名难题。(参见第60页)在绝对化的经验主义立场如现象主

义下,关系问题,不论它是涉及空间、时间抑或因果,总是遭遇质疑。

针对艾氏立场中包含的将句子的事实内容与陈述被给出的时间之间的关系相剥离的策略,丹图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不能将时间性的内容从包含在具时态句子的‘事实性的’信息中干净利落地清除出来”(第55页),他的论证简要说来是这样的:设我们有一个以“恺撒死去”为核心事实性内容的陈述,当它由预先警告恺撒的妻子、行刺他的凶手及另一古罗马政治家安东尼分别说出时,我们三个具时态的句子(a) 恺撒将死;(b) 恺撒正在死去;(c) 恺撒已经死了,在不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三个句子等值同真或同假,但将句子所言说的时间考虑在内,则(a)与(b)是相互矛盾的;此外,假如句子(a)(b)(c)是在同一时间中被说出,其中任一句子为真,另外的两个均假。可见,艾耶尔试图一分为二的句子的两部分内容并非如他所臆想的是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当时间性内容为假,整个句子同时为假。“无时态句子的真不能保证它所有具时态的版本的真,而且,相当确定的是,无时态句子的可证实性不能保证其所有具时态翻版的可证实性”。(第59页)

总之,基于经验证实内在的时间性特性,“就历史句子而言,可证实性不是关于有意义的恰当标准”。(第61页)

二、叙述、解释及生活图像

丹图将原名“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增补本更名为“叙述与认识”是值得注意的。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历史脉络是由“思辨历史哲学”中经“分析历史哲学”再到今天“叙述的历史哲学”的阶段,作为后一阶段先驱与中坚的海登·怀特,他的标志叙述时代

到来的第一本著作《元史学》发表于1973年,而丹图早在1965年(《分析的历史哲学》)即已涉及叙述问题,这大概是他“相信我自己的历史哲学思想在当时是相当具有独创性”且得到同行首肯的原因之一吧。^①不过,与海登·怀特关于叙述的探讨的本体论视野不同,丹图关于叙述的阐述总体上说毕竟仍停留在分析哲学的认识论层面,在历史解释的框架下考虑叙述问题。

丹著关于叙述问题的基本论点是“叙述是一种解释形式”。(第251页)叙述之为解释,换言之,一个关于事件来龙去脉的故事可以满足我们对解释的要求在史学里和日常生活中都是不争的事实,哲学上需要做的是对此给出逻辑上的说明与论证,在丹著中,这就是对叙述满足亨普尔式解释模式特定逻辑条件的揭示。

根据丹图的观点,叙述可以被表达为如下的一般形式:

- (1) x 在 $t-1$ 时为 F 。
- (2) $t-2$ 时某一事件 H 对 x 发生。
- (3) x 在 $t-3$ 时为 G 。

考虑欧内斯特·内格尔曾经举过的白金汉公爵改变其对拟议中的查尔斯王子与西班牙公主之间婚姻的态度例子,其事实意义是白金汉公爵(x)在开始时($t-1$ 时)赞成这一婚事,后来($t-3$ 时)却反对这桩婚事。很清楚,在此,历史解释采取的是叙述的形式:“(1),(2)和(3)本身已经具有故事的结构。它有一个开始(1),中段(2)及结尾(3)。”(第236页)在此,(1)与(3)描

^① See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p. 170. Cf. F.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41.

述了白金汉公爵的态度变化,它们共同构成了有待解释的事项,而所谓解释“就在于在变化的两个时间端点之间填进内容”,(第234—235页)即(2)。

作为叙述中段的(2)可能涉及的东西包括公爵的个性、事情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这种婚姻的政治含义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对于与有待解释事项相关的因果因素,通常我们是具有一般概念的,因此,“我们对构成叙述的关键性中段即事件 H 的抉择必定是根据某些普遍概念做出的”。(第238页)在此,叙述的建构涉及普遍概念或规律的运用,这是叙述之为解释满足亨普尔覆盖律解释模式要求的地方,它验证了亨普尔所强调的“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运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普遍规律所起的作用至多只是给出一个寻求因果的方法论指令,至于导致变化的具体原因,则需要由历史研究中找出相关事实。因为,同一普遍原则下往往可以覆盖不止一同的具体事例,从而这些普遍原则与具体事例之间永远不具有——对应的逻辑关系,简单的例子如,同样由于怕痛(一般人性),有人的选择是找牙医,有人则宁死也不肯登牙医诊所的门。或曰,这可以根据人的不同类型的——一般概念得出进一步的解释。但问题并不因此而变得简单:我们也许知道白金汉公爵是个骄傲的人,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精明的人,两者都可能与他的态度转变有关,在此,我们首先得排除的是“类型”意义上的其他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同一类型下还可能“成员”意义上的其他可能性,即同一类型所包含的不同具体情况。总之,一旦我们找到了一个关于所述事项的具有说服力的故事,从中不难分析出其所包含着某些普遍概念或规律,问题是适用的规律往往不止一个,而对此我们在事前是无法先验确定的。此外,历史事件往往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因果链条,这样,对它的叙述往往可以划分出如丹图提出的“原子叙述”和“分

子叙述”这样的不同层次(参见第252—254页),在各个片断上我们都可以找到符合某一普遍规律的因果关联,但却不存在足以覆盖整个事件全部发展的统一历史规律,就好像丹图打的一个比方:一个人从美国纽约州的威切斯特县到非洲国家肯尼亚首都的内罗毕只能依次换乘地铁、飞机、火车和船,没有一种单一的交通方式可以让一个人完成这全部的行程。总之,叙述作为一种解释形式“并不总是可以被归结为演绎论证”,(第251页)具有一般解释特征的历史叙述与亨普尔以演绎性为特征的解释模式的相似性在此瓦解。

叙述的解释与亨普尔解释模式的不完全吻合涉及历史解释与科学解释的关系问题,按照历史哲学中文德尔班、狄尔泰以来人文主义流派代表人物的看法,这表明了人文与自然不同的存在论特征,而在科学一元论者看来,这也许只是人文学科本身不发达状况的表现。丹图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大体上属于后者,但其立场的基点不是简单的要求人文学科向自然科学看齐,而是强调包括亨普尔在内关于科学的理解乃是前库恩时代的产物,在库恩领头的科学哲学革命的视野中,“叙述已经成了科学哲学本身的中心”,(第xiii页)科学本身“远较实证主义所敢于设想的更近乎人文事业”。(第xi页)不过,公平地说,在当代学术发展的实际图景下,人文学说与自然科学间的分野似乎并未看到任何明确的弥合趋势,考虑到前者与后者至少是一样悠久的学科发展史,如果我们也不愿由各自学科从业者的群体素质方面考虑差别,那么,关于各自研究对象差异的考虑毋宁仍然是相当合理的思路。

尽管解释问题在丹图关于叙述的论述中占据主要的地位,但他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对于叙述的意义也有相当深刻的理解。根据丹著的论述,他已经将叙述上升到人类认识与表达世

界的基本方式的高度,就此而言,他与当代历史哲学中叙述主义名家如海登·怀特和保罗·利科虽非并驾,实堪齐驱。丹图不但由其叙述句的语言分析中得出“叙述结构渗透我们关于事件的意识”(第xii页)的观点,并进而看出,“我们关于自己生活的图像必定深刻是叙述性的”,(第xiii页)根据这个观点,一方面,我们都置身当下存在中,是生活与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具有类似叙事者(不论是史家还是小说家、戏剧家之类讲故事者)那样的超越当下事件的事后他者即旁观者的眼光,这使我们能够从某一预拟结局的视角将自己当下经历的事件作为今后被述说的故事的一个有机部分来看待,在此,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行到死”在叙述的角度看实即“先行到故事结尾”,而生活事件的意义则由特定的叙述意识也即历史意识中生发出来。由此再进一言,基于历史叙述如《春秋》中所获得的历史感,人类,至少是那些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经由“烦”与“畏”超越“沉沦”达致对存在的“领会”的个体将在生活实践中“筹划”和书写春秋(“甘洒热血写春秋”),这样,叙述性不仅渗透认知(事件和生活图像),并且进入我们生活世界的存在。丹图在讨论叙述句子时对维特根斯坦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观点的引证,(第351页)于此义已有所触及。最后,也许还应该提及一句的是,他从当事人与叙事者角色重叠的角度对黑格尔误将叙述文本的结构直接等同于历史的结构的批评(参看第357—360页)是很有见地的。

三、丹著的意义与启示

作为一本分析哲学风格的历史哲学论著,丹著在本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意义由其所提供的专业观点与见解担保,以上我

们的论述实已有所论及。这里我们对丹著意义的探讨,侧重点是从更为宏观一般的哲学层面上揭示丹著的学术特色与价值,以及由此引出某些与历史哲学学科建设有关的理论反思。

国内对分析哲学的引进与讨论已经很多,但是,它们似乎大多属于以分析哲学为对象的概论式作品,而丹著为我们提供的则是运用语言与逻辑分析手段讨论具体哲学问题的个例,例如关于“意义证实原则”、“(过去的)指称问题”及“历史解释”这样一些标准分析哲学问题的讨论,均属此例。他从语句如“过去参照谓词”、“未来参照谓词”及“叙述句”角度对史学中包含着的哲学问题的切入对拓展我们的思考视角相信是有一定帮助的。

此外且更重要的是,丹图为学以问题为中心,不囿于一家一派的成见,作为“主要作品在风格和精神上都属于我所献身的分析哲学运动的范畴”的人,^①丹图同时还是《萨特》和《作为哲学家的尼采》的作者,出入于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正是丹著十分可贵的特色。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基本的学术话题都是来自分析哲学的,尤其是由“关于历史认识可能性的三种反对意见”一章开始连续三章关于历史话语的“意义”、“指称”及“客观性”,完全是分析哲学的理论路数。此外,语言和逻辑分析手段的运用对论题的切入与论证提供了利器,其在“思想清晰性与逻辑性的追求”^②方面的工具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他通过句子分析的手段对历史中内蕴的时间性维度的论证令论题具有相当的明晰性与确定性。但是,仅此并不足以保证一种哲学思考的思想深

① See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p. 170. Cf. F.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6.

② Ewa Domanska, *Encount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 p. 170.